



中断的十年

——盖莱克答记者问

〔波兰〕雅努什·罗利茨基 著



中断的十年

——盖莱克答记者问

[波兰]雅努什·罗利茨基 著

于欣 鲁海 萍如 译 于欣 校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Janusz Rolicki
EDWARD GIEREK;
PRZERWANA DEKADA

根据华沙事实出版社1990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孙建廷 伍永光

封面设计：丁 品

中断的十年

——盖莱克答记者问

[波兰]雅努什·罗利茨基 著

于欣 鲁海 萍如 译 于欣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5 字数：207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012-0458-6/K·87 定价：4.2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1990年，盖莱克《中断的十年》一书在波兰出版。书中，盖莱克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叙述了他个人的生平及波兰战后的历次重大事件，同时穿插了他同东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教会首脑会谈的情况。特别是，他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矛盾和斗争较为详尽的阐述，向读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爱德华·盖莱克在70年代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最高领导人。他生于卡托维兹省的一个矿工家庭。10岁那年，因生活所迫随母亲侨居法国。13岁开始下矿井做工，18岁加入法共。1937年，他迁居比利时，继续在矿区从事体力劳动。战后，他回到波兰，从事党务工作，从一名普通的中央指导员逐步升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并长期在他的故乡——波兰重要工业区卡托维兹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970年12月波兰沿海地区发生大规模工潮时，他取代哥穆尔卡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执政的70年代，既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又是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酝酿形成的时期。在1980年声势浩大的抗议罢工浪潮的冲击下，盖莱克作为对危机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人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又被开除出党。从此，他从波兰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1989年波兰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后，盖莱克同记者雅努什·罗利茨基一起着手编写这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中断的

十年》。该书一问世，在波兰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许多读者和某些事件的当事人对书中阐明的观点、结论和提供的事实提出异议。鉴于此书对了解盖莱克本人和波兰战后的历史进程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特把全书译出，献给读者。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波兰社会对该书的不同观点和看法，特将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撰写的《关于盖莱克答记者问》一文附上，供研究参考。

1992年1月3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少年和青年时代	6
第二章 走向顶峰之路 ——从指导员到第一书记，1948—1970年	25
第三章 七十年代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71
第四章 一个被废黜者的角色	239
后 记	261
附： 《关于盖莱克答记者问》 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	263

前 言

记者：1980年9月5日，你没去参加议会会议，过不久说你住进了阿尼纳政府医院。这是怎么回事？

盖莱克：为了筹备议会会议，我整夜都在工作。我要在议会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清晨，我感到胸部剧痛，呼吸微弱。我虽然没有晕倒，但我的感觉是末日正在临近。最近几个月的感受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毫不惊慌地叫醒妻子，要她请医生来。半小时后，值班军官叫来了急救车。雅努谢维奇教授赶到我在华沙郊区克拉里塞夫的公家住宅，过一会儿希里文斯基教授也赶来了。

记者：是卫生部长吗？

盖莱克：是的，希里文斯基教授当时是卫生部长。两位教授给我检查了身体，做了心电图，并毫不迟疑地把我送到阿尼纳医院。在那里，我住进专门病房，后来知道，我还受到特殊护理。在我周围摆放着各种监测仪器，整个8天我像个真正不幸的人躺在那里，在以后的8周内，我得到医院最好医护人员的护理，主要是霍夫曼诺娃、雅努谢维奇和基宾斯基教授。

记者：除了举行议会例会，当天早晨听到你生病的消息后，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担任第一书记。当晚，紧急召开的中央全会批准了政治局的这一决定。是不是有人

向你通报过所发生的一切？

盖莱克：没有。没有人向我讲过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也没有人来看望我，来了解我的健康状况。直到次日清晨，卡尼亚来到我身旁，他显得情绪激昂。尽管他睡眠不足，但谈笑风生，得意洋洋。在他走进我病房之前，我听到他同霍夫曼诺娃在大声交谈。她说，按医生的意见，卡尼亚前来探望是不适宜的。我几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孱弱得像个婴儿。老实说，与其说我在听这个人说话，不如说我在听监测仪器喇叭传来的我那均匀的“咚咚”心跳声。最近10年，是我把他送上党的最高职位。这是我的不幸，不，遗憾的是，这不仅仅是我的不幸……

记者：你生病前，卡尼亚是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1970年12月在你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时，他担任什么职务？

盖莱克：他是中央的一个部长。

记者：这么说，他的提升受惠于你了？

盖莱克：当然。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卡尼亚的这次探望上来吧。我清楚记得，他十分严肃地向我通报说，已决定把我从繁重的职务中解脱出来，这付最重的担子已落在他的肩上，因为他代替了我，被选为第一书记。他说话时尽管装出一副哭丧的嘴脸，但无法掩饰他的欢欣。当时的气氛不太愉快。我不知道有何理由去分享他的快乐。他急忙向我保证：只要我一恢复健康，将根据中央的意见任命我为党的主席。我向来不信奉震颤性麻痹医学理论，因此当时我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国内困难的形势下，还需要这样一个职位，就像桥上需要一个洞……，先生，我同卡尼亚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如此。他走出病房，迈着矫健的步伐去治理党去了，而我则孤零零地留在那里，同监测仪器厮守在一起。很快我

就明白了，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同政治上的一切联系都已中断了。在我恢复期间，我任命的最后一位总理约瑟夫·平科夫斯基成了这幢楼房的常客。他经常来看望生病的母亲。当我的侍卫官建议他来我这里坐一会儿时，他以工作繁忙为由婉言拒绝了。

记者：延长了患病的时间，还面对着政治上的荒漠，对此你是怎样忍受的？

盖莱克：先生，我当时的确病得很重，医生十分担心有一天会再次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环境如何，人总是内向的。但我不抱幻想，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灾难时刻已经来临了。然而，有几件事使我感到欣慰。经过几个夜晚的深思熟虑，我得出结论，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使我感到自豪：第一，尽管命运有阴差阳错——坦率讲，这种情况还不少——但我终究同罢工工人达成了协议；第二，尽管我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但一种想法支撑着我，即我是迄今波兰唯一的手上没沾有自己同胞鲜血的第一书记。我忠实地履行了10年前向人民和自己提出的保证。

记者：你在医院住了多久？

盖莱克：10个星期后，我出院了，同妻子一道住在坐落在皮利察河畔斯帕瓦的一座宫廷建筑物中。

记者：1980年秋天，我从电视评论节目中看到你这幢府邸。评论员描述了那里极其贵重的设施和价值连城的古董。许多人看了这个节目后，都认为你的住房实在太多了。

盖莱克：斯帕瓦过去是波兰共和国总统的府邸，莫希奇茨基宫也不是我盖莱克建造的。对一个失业者，一个从法国被驱逐回国的矿工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说真的，我在华沙很快就找不到住处了。当我离开克拉里塞瓦公家的官邸

之后，1981年2月就回到我在卡托维兹的住宅。

记者：你是否曾是国家的囚犯？

盖莱克：不是，形式上不是。最初，我生重病，不能走出医院。我被完全隔离起来了，甚至一段时间内还不允许我的儿子们来看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没有询问守卫我的军官得到过什么指示。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不知情要比知情好。

记者：有时你在政治上是否也采取这一原则？

盖莱克：你这是开玩笑。在当今世界上，像波兰这样大小和这样特殊的国家，不论谁执政都不会把头埋进沙堆里，否则不出一年就会丢掉政权。

记者：在新形势下，你心理上是否有时对身边军官角色的变化而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从侍卫者变成了看守者。你感觉到这种差别吗？

盖莱克：我不会推测出你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的前程如何。我向你担保，这些人也不会因自己命运的变换而成为幸运者。但是，我不能讲他们的坏话。不论谁，从来都没有像瓦伦小说所说的那样成为我的“糖果”，但是对任何人来讲，我想，我都不是毫无良知的暴君。

记者：舆论工具至少是把你描写成了一个很不诚实的人，把所有坏的特点，特别是任人唯亲都加在你的头上。承受这种政治和道义上的失败，需要有特殊的性格力量。我同其他人一样经常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是怎样忍受这种异常情况的？

盖莱克：先生，在行使政权的冒险中，总是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失败。至于道义上的失败……，仇视运动来自何方？不是来自“团结”工会，而是来自不久前还是我们党内的同志。当这种仇视运动过后，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承认，假

如我的敌人有反对我的充分理由的话，那就会把我押上被告席。这确实是卡尼亚、莫查尔的计划之一，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记者：迄今还没有这种先例。我想，勃列日涅夫根本不会允许这样做。

盖莱克：先生，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很想进行报复。他不得不长时间对“团结”工会的存在装作视而不见，并把“团结”工会的兴起归罪于我。面对着制度上的如此重大问题，审讯一个法国和美国老牌间谍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记者：啊？？？

盖莱克：有人打算这样给我定罪，我有证据。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使我感到最痛心的是针对我一家展开的仇视运动。我只想谈谈报纸和电视上提供的让人们相信的“事实”：说我妻子到法国去烫发，说我儿子是根据我的指示才成为教授的，还说我儿媳妇开设私人医院等等。我病愈后——那时我已回到卡托维兹——我就用仍安放在我家里的政府电话同卡尼亚通话。奇怪的是，没费劲就给我接通了。当时我说：“你想同我斗争吗？那就请便！活见鬼，你不要把我一家也扯进去。”你知道我从这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那里听到了什么？

记者：？？？

盖莱克：他说：“盖莱克同志，你还记得你是怎样同雅罗谢维奇合伙整我的？你也许忘了，可我还记得。我现在就告诉你整人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到死都会记住我。”你承认不，这些话十分凶狠。你会问，我是怎样忍受这一切的。此外，你会看到，我的反对者深感痛心的是，我活得完全不错。秘密在于，我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必须在自己生活中同命运的波折去抗争。简而言之，是生活锻炼了我。

第一章

少年和青年时代

记者：如果抛开那些乘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其他活动之机在报上公布的正式简历不谈，那么在你的生活中可能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

盖莱克：这就是我们党文风的根本特征之一。过了一段时间后回顾这种习惯，我认为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愚蠢。共产党人的谦虚风格使我们千人一貌。反对个性，是理论主张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只有演讲和党中央大厦的摄影成为了解我们情况的主要消息来源。

记者：让我们从头开始撰写你的经历。你记得童年的一些事情吗？

盖莱克：我的最早的回忆是同煤矿区联系在一起。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一年半的时候，我在矿山的阴影中诞生了。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在“卡吉米日—尤留什”矿不幸去世，我成了无父的孤儿。透过我家的窗子，就可以看到这座矿山的矿井。当气压低沉之时，矿山锅炉的浓烟就通过窗子的缝隙进入我家。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水盆中浸湿抹布，母亲用它塞窗缝，以防止呛人的气味渗入。

记者：战争刚结束时，许多知识分子热切地寻找无产阶级祖先……，你的困苦的童年和工人出身，对某些活动家来

说，只能是令人羡慕不已了。

盖莱克：从这一点看，我确实处于比别人更有利的地位。假如我不是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你作为矿工节时采访正面的英雄人物的记者，是可以大胆地来找我的。我是第四代矿工。我的外曾祖父是矿工，外祖父也是在“卡吉米日”矿挖煤，并在一次事故中牺牲了。我父亲去世后，甚至我母亲也到矿上工作，她上班时把我和一岁的小妹妹反锁在家中。因此，我四岁的时候就负起小保姆的责任，这样过了整整两年，一直到1919年9月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1919年9月独立波兰的第一个学年开学了。

记者：你是一名好学生吗？

盖莱克：我不记得练习本上的成绩了，但我非常喜欢看书。小时候母亲常常怪我在书本上浪费时间而惩罚我。

记者：你是怎样去法国的？

盖莱克：西里西亚第三次起义后不久，母亲改嫁，继父安东尼·雅罗斯在1922年抑或在1923年去法国寻找工作。最后他在中央高原找到了工作，不久把我们接去了。1923年5月，我还是在波兰时获得了小学四年级结业证书。

记者：离国的感受很强烈吗？

盖莱克：你知道，当时的波兰，特别是对于矿工来说，并不是黄金铺地的国家。两次大战期间的贫穷，这绝不是共产主义宣传捏造出来的。因此，要我前往国外的矿山的福地，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感。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我并没有到达天堂。

记者：你感到过法国人的仇外吗？

盖莱克：深深感到自己是身在异国他乡。我住在波兰居民区中，开始到波兰政府聘任的波兰女教师那里上课。说实

话，我满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波兰属性之中。所幸，我对这个新的国家很感兴趣，继父和母亲像把我抛入大海一样送我到法国学校读书。因此，在语言上我未成为哑巴，经过三年时间，我掌握了基础法语。我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美丽而艰深的语言，多年后，当我先后同三任法国总统会见时，我可以不借助翻译毫无愧色地同他们交谈。

记者：你讲到中央高原使我感到意外。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把你在法国的旅居同你在法国北方的逗留联系在一起。

盖莱克：你说的并不十分准确。由于我继父这位矿工的特有的个性，在我青年时代，我同他以及母亲和妹妹曾经搬了十几次家。从中央高原迁徙至马赛郊区，尔后又迁至加来海峡，迁至阿尔萨斯，后又返回加来海峡，并从那里迁往巴黎。在巴黎我好像流浪汉一样生活，常常在林荫大道上和救国军的掩体里过夜。在一段时间里我还住在瑞士边界上的贝尔福市郊，在那里我们清理被德国人用水淹掉的老矿井。我13岁时，开始在阿温贝格·瓦勒斯工作，根据法国规定，还不够年龄，因此就多报了一岁。他们送我到矿上，第一天就下井干活。我长得不高，背着的矿灯几乎拖在地面上。在米尔豪森，我们居留时间较长，约二年。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继父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染上了肺病——矿工的灾星，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在20—30年代之交，继父想落叶归根，返回波兰，而我却在加来海峡的拉福尔斯特开始了成熟的矿工生涯。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尔后，于1939年回到波兰。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盖莱克：这同已经成为我生活内容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当我满18岁时，说实话，满17岁时，我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记者：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个党和这一意识形态？

盖莱克：对于有我这样经历和出身的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来说，别无其他选择。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勾勒出更美好的未来。只有奋斗，才能赢得这一美好的未来。但年轻人都是好高骛远的……，此外，我来自所谓的三个皇朝的三角地带、政治上异常活跃的地区。我父亲曾是一位执著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我记不清他了，但在家庭的气氛中仍然保留着他的精神。

记者：当时，特别在波兰，社会党人并不十分喜欢共产党人。

盖莱克：在西里西亚矿区工作几年后，对此我也深有体会。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当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时，他搓着手说：“耶稣玛利亚，老盖莱克大概在坟墓中会焦躁不安了！”但当时在法国，这是无所谓的事。另外，你知道，我是典型的自学成才的人，例如前面提到的阿温贝格·瓦勒斯那个地方就培养教育了我。在那里，我不仅开始了职业工作，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拥有2000卷藏书的图书馆。我在那里阅读书籍，可以说是一本接一本地吞噬。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自己是在爱好文学和戏剧。这种热情使我在拉福尔斯特成为戏剧小组主席，一个人既当演员，又担任导演和编剧。

记者：你编写了什么剧？

盖莱克：譬如《什韦伊卡》，我们演出近十次，甚至法国人也来观看。他们看不懂内容，但是他们很喜欢这个剧。

记者：你17岁时成为法共党员，这对你的世界观有什么影响？

盖莱克：我对你说过，读书是我的生活爱好之一。我十分严肃地对待党证。我几乎把从书本上吸收马克思主义的ABC当作自己的义务。结果，我接受了人们所说的科学的世界

观。你可以想象，这使我摆脱了宗教的影响。

记者：从传统上看，矿工界是最信教的，你的亲属对你有何反应？

盖莱克：当然，母亲是不高兴的，但是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即允许态度和观点上的某些自由主义的存在。一直到14或15岁时，我还参加过圣母像前的集体祈祷。在家里每餐之前都作一次简短的传统祷告。母亲信仰宗教，虔诚而不狂热，因此，她以伤感和理解的心情接受了我的决定。她承认，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她无权干预。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才偿还了对母亲承担的道义上的债务，我实现了向她许下的为她举行天主教葬礼的诺言。

记者：在你母亲去世时，你已经不是党的领导人，甚至不是党员，这一事实不恰好帮助你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了吗？

盖莱克：告诉你，我至死都是共产党人。这与党的领导集团作出的决定无关。我也可以向你表明，即使当时我是第一书记，我也会尽心尽力地诚恳地兑现向母亲许下的诺言。

记者：那就不会有4万人去参加葬礼了……

盖莱克：我认为，向失败者表示善意，是我国社会高尚的特征。

记者：我觉得你的同情者还为数不少。他们认为，你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对他人的观点和态度的容忍。但在党内，不管是在8月前还是在8月后，却无人夸奖你的这一特点。

盖莱克：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在整个生活中形成的，但青年时期却常常留下极深的烙印。我在法国人中间生活了11年，注意地观察了他们。我非常喜欢他们在表述观点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以及善于区分什么是私事和什么是公事的本领。譬如说，在会上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可

走进餐馆之后，他们就把争吵丢到门外去了。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同。回到波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习惯这里的僵硬。一种不折不扣的野蛮习俗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走在大街上同政治上的反对者迎面相逢时竟然作出视而不见的样子，并且示威式地向他表示不满，等等。我不认为只是我们的历史对此种态度造成了影响。南方人和西方人都诚恳开朗，我们则一向缺少此种特性，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仍然缺少这一特性。

记者：我从不怀疑，在专制制度下领导人的个性会给国家的政治路线造成根本的影响。

盖莱克：不应由我来评论我本人活动的成果。只是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来不愿意成为太上皇，从来也不因他人之卑微而感到快慰。1970年12月19日我面向社会发表电视讲话时，我认识到我们必须结束排斥异己的一切表现，包括在民族方面、主义方面以及世界观方面的一切表现。我还可以向你说明，这不是出于利害的考虑，而是出于深刻的内心需要。

记者：再谈谈你的青年时期和最早的政治经历。你曾是法共的积极党员吗？

盖莱克：是。我参与了一切形式的党的活动。当时我年青，热血沸腾，我认为只有走《共产党宣言》的道路，我才能促进更美好的世界的诞生。

记者：这种积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盖莱克：我参加了党，此外，我还参加了共产主义职工会，《红色援助》组织，以及类似波兰的《欧姆杜尔》的文化—教育协会。在这些组织中，我很积极，参加许多活动，包括几次罢工活动。我既懂波语，又懂法语，这大有益处。